往 事

浐河岸边是家乡

浐河是从终南山的三条河里流出来的,先后在白庙村、嘴头塬的末端交汇,一路向北奔流而去,最后进灞河、渭河,入黄河。

小时候,每从嘴头塬下经过,我总要停下脚步望远处的山,看近处的塬,端详脚下的水。然后就想,几条不知名的河是什么牵引着它们汇合在一起,每想至此,总觉得是一种神秘的无法破解的力量给它们指引了彼此的方向。

浐河的主源头在终南山的汤峪,山里的水十分冰凉,汤峪的温泉水却异常热,最热的上百度,鸡蛋放进水中立刻就被煮熟。因此,这地方很早以前就有天然的热水澡堂子,人们来这里疗伤、治病、健体、洗澡沐浴。来的人多了,名声也越来越大。可惜的是,因为我们村地处浐河中游,河水流到时一点热气也没有了。

许多年以后的一天,我们村的人听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说,有热水的地方叫东汤峪,那热水是那一次大地震造成的结果。这位戴眼镜的中年人是城里人,据说是水利专家。地震使这里的祖辈人遭受了一场大灾难,却给他们的后代留下了这些福分,看来老天爷也是公平的。

浐河的两岸尽是肥沃的田野,有水田也有旱地,水田种稻谷,旱地长小麦、玉米,年年岁岁,五谷丰登。村庄树木簇拥,多在塬脚之下,有窑洞,有厦房,还有小楼房,厦房多是单面一坡,窑洞冬暖夏凉。站在高处极目望去,浐河像一根银链,从远处缓缓伸来,又向远处缓缓伸去。

浐河滋润着两岸的土地,养育着两岸的人民。居住在河岸边的人脸方、目圆、鼻阔、唇厚,骨胳强健,生性善良,勤劳勇敢,他们用双手耕种着脚下的土地,养育着子孙,建设着家园。秋播、春锄、夏收、冬储,风里来雨里去,终年辛勤劳作,使得一方土地格外夺目诱人。浐河岸边,春天绿草成茵,繁花似锦;夏天艳阳高照,麦浪滚滚;秋天牛羊肥壮,硕果累累;冬天银装素裹,风光迤逦。

浐河边生长的孩子多喜水,夏季的河滩就是他们的乐园。每天中午,小家伙们扔下饭碗就往河里跑,纵然有家长阻拦,也会想着法儿逃出去。于是,河滩上就有一群群光屁股的精灵在烈日下跳跃,他们在河水里游泳、摸鱼、抓虾、打水仗,在河渠里捉鳖、掏螃蟹。趁看菜园子的人午休时,还会钻进菜地偷摘西红柿、黄瓜,一个个都成了小泥猴。直到家长或者看菜园子的吼着叫着赶了来,他们才抓上衣服四散逃去。

傍晚的浐河便成了男人们的天地,劳累了一天的他们要到河里来洗澡,疲惫的身躯在清凉的河水里一浸泡,精神马上恢复,顷刻间激昂悲壮的秦腔就在浐河上空飘荡,直到女人拉着长调呼唤吃饭才会走出河水。

淘米、洗菜、洗衣的女人是浐河的一道风景,棒槌声、欢笑声、河水声,响得浐河更加生动。河滩上一件件晾晒的衣服,又使浐河的色彩格外亮丽。衣服洗完了,女人们常常会卸下头上的发夹,解下头上的皮筋儿弯腰洗头,那黑的发在清清的河水里水草一样摇曳,河水把女人的脸浸润得格外水灵,看得岸边的男人便发了呆,在女人们的笑骂声中才尴尬地回过神来……

我的老家师村,距西安市中心的钟楼约五十华里,背靠白鹿原,面向浐河水,南可见挺拔俊秀的终南山,往北不远是充满神秘色彩的鲸鱼沟。

师村是一座古老的村庄,村民世代挖窑洞而居。秦汉以前,这里曾是利用白鹿原原始森林集中烧木炭的地方,至今村子的山坡上、崖坎下还留有烧木炭的小窑洞。这些烧木炭者,在此居住生活了不知多少代,逐渐转为以农桑为主,因而这里又盛产小麦、稻谷、玉米,是一个地道的农业村。师村村风传统古朴,村民善良厚道勤劳,性格豪放直率。尽管一村多姓,但和睦相处,亲如一家。

师村最早叫狮村,来历有三种说法,一说秦汉时期浐河川叫“斯川”,因该村地处斯川之中,故以斯村为名。后因“斯”“狮”同音,“川”“村”近音,就将“斯川”叫成了“狮村”。另一种说法,是师村的地形像一头狮子。第三种说法,是因村中央的崖头上有一尊石狮子,所以村名为“狮村”。《陕西省长安县地名志》(2000年出版)记载:“狮村,长安县东部著名大村,有475户,1950人,耕地1682亩。有狮村小学。相传,宋代该村天降陨石一块,其形如狮,得名狮村。清嘉庆《咸宁县志》记为狮村。《咸宁长安两县续志》则记为师村。今分为师村、新师村。

浐河新貌

据说,中华民国年间,该村村民赵炳元的老师牛兆濂讲学回家路过师村,在赵炳元家住了几日。赵炳元陪老师游览本村古庙、古迹,牛兆濂看到这尊石狮子,端详了许久,然后说:“这是一块大陨石,经人工雕刻而成。”赵炳元问其多久时间,牛兆濂说:“看造型和古朴程度,应是秦汉之物。”牛兆濂是白鹿原一带很有名的大才子,上知天文,下识地理,他的话不会错。于是,从这一天开始,这尊石狮子终于有了真实年纪。

2000多年了,这尊石狮子,伴随诸多姓氏的村民在此居住,繁衍生息,生产生活。明代时,有周、赵、戴、李、柴、倪六姓村民在此居住,将狮村改为“六合村”。后又觉得有诸多不好,经六村族长商议,改回仍叫“狮村”。狮村改叫师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,据说是汉字简化的原因,狮村的笔画多,那时候村干部多数文化程度不高,嫌麻烦。改“师村”为“向阳村”,是在文革期间,一股突如其来的红色浪潮把“师”字彻底洗刷了,不过时间很短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天,村头刚通公交车的汽车站牌上写上了“诗村”两个大字,这显然是公交公司管理人员的失误,年轻人都说好,村里老人却齐声反对,不久,汽车站牌上的“诗村”就改成了“师村”。

浐河古桥

师村现在的村民以周、赵、戴、李为主,还有田、倪、张等姓。师村的历史上,曾有柴、罗、水、鄢等姓的人在此居住,后因战乱灾荒,这几姓人逃亡他乡,再未返回。师村至今仍有“柴家坡”“柴家砭”“柴家硷”“罗家坡”“张家沟”“水家坡”等地名。

周姓是师村人口较多的一姓,其人口占全村的百分之五十,赵姓占百分之二十,戴姓占百分之十五,李姓占百分之十二,其他姓占百分之三。

据传,周姓是明洪武十三年由江南健康县迁来的。还有一说,是元末明初由湖北保康县迁来的。不管来自何处,有一点可以肯定,师村周姓是从外地迁来的,居村中间。来时兄弟四人,为师村周姓四门之祖,与一河之隔的周家崖是同宗。中华民国时期,周家崖每年来师村周家老坟共同祭祖。抗日战争时,国民政府陆军第八师三团把周家老坟作为练兵操场,周姓祭祀祖坟中断。

周氏人丁兴旺,迁来时只有四户,现在人口达到1400余人。清代,周定邦(人称五老爷)考中武举,周守贵、周守林兄弟中武秀才。近代人才更多,有县处级以上官员,有厅局级的领导,还有书法家、画家和作家。

师村原有明熙寺、金玉宫、戴家无量寺、周家祠堂等十多座庙宇,其中明喜寺和金玉宫为全村之庙,影响也深远。

明熙寺,原称“洞庙”“娘娘婆庙”,建于北宋时期。主要塑像是九天圣母、送子娘娘,其后塑像又有增添。明太祖洪武年间,皇上赐封“明熙寺”,皇封锦扁悬挂在庙中大殿内。农历二月初八为会日,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纷纷前来,祈福求子着成群结队,三兆、春临、瓦胡同、曲江、鲍北、东兆余、东伍村、赵家湾、郭家滩、史家坡、史家寨等十多个村子锣鼓队前来助兴,舞狮子、跑旱船、走高跷、唱秦腔,阵势壮观,热闹非凡,令人震撼。明熙寺屡有修复,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毁,1990年重修。

金玉宫,又称玉皇庙,初建何时不可考。《咸长续志》记载,明代就有金玉宫,主要建筑为窑洞,供奉有玉皇、玉皇老师天大大、大祖师、二祖师、地母、黄龙和青龙塑像,院内柏树林立,院外草木葱茏。《咸宁志》载:“金玉宫在狮村,宫北崖高十余丈,崖下有洞泉二,洞内多矾石,其水如珠,由洞之额循而下之,日夜叮咚,颇类琴音。”当地人称“琴音洞”,也叫“叮叮当当”。当年,有一才子路过此处,为洞泉奇景所吸引,当即赋诗一首:耳畔叮当真好听,疾步近前赏琴声。四下瞧望无琴师,原是洞中滴水声。

乡人云:“二洞始见,各有鲤鱼一尾,一色黄如金,一色青如玉。初亦不甚异之,既大旱一日,洞泉忽水罄,愕间风雨聚至,四野沾走,岁大热。自此,每旱洞泉水溢即有雨,村人感之,立庙为祀。”金玉宫以鱼色命洞,一曰“青龙洞”,一曰“黄龙洞”。农历正月初九为会日。人们相传饮洞泉水能治百病,前来进香祈福者络绎不绝。

传说,长安城的皇帝每到白鹿原及终南山打猎,必带文臣武将及随从至金玉宫休息,除进香外,必饮神泉水解渴。此时,师村斜对面的等驾坡已是彩旗飘扬、人声鼎沸,浐河之上,渡船待发。其阵势十分雄壮,现在想来也是盛景。

民国时期,杨虎城将军之母孙一莲久病不愈,其义子赵彦武(赵家顶人)建议到金玉宫求神治病,并用神泉水煎药服用,果见大效。孙一莲因在金玉宫治病灵应,从西安请来石狮、石羊、石鼓等,赠予金玉宫,以表谢意。文化大革命时,村民将这些宝贵文物埋入土内,1993年挖出安放在新师村村口至今。

明代至今,金玉宫香火不断,期间曾遭兵匪祸害,但屡毁屡建,凡有祈祷,多著灵异。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中神像被毁,树木被砍伐。1983年大雨造成塌方,金玉宫建筑和两洞泉均被埋入土内。1993年村民按原庙神像修复成现状,其洞泉被改造为供村民吃水和用水的自来水之源。

浐河历史悠久,一河两岸,像师村这样的历史名村不可胜数。而且每一条支流,每一个节点,都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。 □周养俊

语林指瑕

《始闻秋风》中的“君”与“我”

唐代刘禹锡有《始闻秋风》诗云:“昔看黄菊与君别,今听玄蝉我却回。五夜飕飗枕前觉,一年颜状镜中来。马思边草拳毛动,雕眄青云醉眼开。天地肃清堪四望,为君扶病上高台。”这首诗因始闻秋风而作,其中的首句和尾句,各有一“君”字,第二句还有一“我”字。“君”指谁?“我”又指谁?

人民文学出版的社科院文研所《唐诗选》谓:

前两句代秋风设辞。“君”,是秋风称作者;“我”,是秋风自称。依《礼记·月令》:季秋(九月)“鞠(菊)有黄华(花)”,孟秋(七月)“寒蝉鸣”。“看黄菊”是在九月秋序已尽,所以说“别”;“听玄蝉”是在七月,秋之始,所以说“回”。

末两句是作者对秋风之辞,有感谢秋风能使我克服疾病,精神振作的意思。“天地肃清”,秋气严肃而清爽。“君”,指秋风。

上海辞书出版社的《唐诗鉴赏辞典》中,关于该诗中“君”与“我”的说法亦与前者相同:

开头两句“昔看黄菊与君别,今听玄蝉我却回”,就别出心裁地创造了一个有知有情的形象——“我”,即诗题中的“秋风”,亦即“秋”的象征。当她重返人间,就去寻找久别的“君”——也就是诗人。她深情地回忆起去年观赏黄菊的时刻与诗人分别,而今一听到秋蝉的鸣叫,便又回到诗人的身边共话别情……

对于最后两句,又鉴赏道:

啊!寥廓江天,山明水净,真是“秋容一洗,不受凡尘涴。许大乾坤这回大。”(陈亮《洞仙歌》)我就是抱着这衰病之躯,也要登上高台,放眼望,为“你”——胜过春色的秋光引吭高歌!

这样的解释和“鉴赏”,直使人眼花缭乱。试想,刘禹锡,诗豪也,作诗竟让读者如此费解。八句诗中,“君”竟两指,“我”,也指了秋风。难道这是对答诗,“秋风”的“我”说了两句,便不做声,因为那后六句中,分明是作者的“我”为主体也。这是未究诗作背景的臆解。

以诗中所说的“一年”和两秋来看,刘禹锡作此诗的时间,只有两个接点,而且都是发生在两游玄都观诗作之当年。

刘禹锡系政治精英,顺宗时,永贞元年(805)他参与“二王(王叔文、王伾)的政治革新(即永贞革新),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,任屯田员外郎。该年八月,在宦官和藩镇的联合进攻下,顺宗被迫退位,其子李纯即位,是为宪宗。王叔文随之被赐死,王伾遭贬病死。此次政治革新失败。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坐“二王”案皆被南贬远州司马,其中三十四岁的“禹锡被贬连州(治今广东连县)刺史,未至,斥朗州(治今湖南常德)司马。”(《新唐书·刘禹锡传》)元和九年(甲午岁,814年),诏书尽征刘禹锡等被远贬者回京。刘禹锡于当年十二月自武陵(朗州州治)赴京,到元和十年(乙未岁,815年)二月初,行至长安近郊,作七绝一首,中有句云:“十年楚水枫林下,今夜初闻长乐钟。”他以为“逐臣”的生涯可以结束,此后将有发挥才能的机会。谁知又因一首诗,他又被远贬。

这年三月,他写了《元和十一年(当为“十年”,系传写之误)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》诗云:“紫陌红尘佛面来,无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观里桃千树,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被认为是语涉讥刺,当路者不喜,他又被贬为播州(今贵州遵义)刺史,经御史中丞裴度陈情,说服宪宗收回成命,改授其连州刺史。

此贬又是十有四年。直至文宗大和二年(828)春,五十七岁的刘禹锡方被任命为主客郎中,回到了长安。前此一年秋日,他由刺史任上改授主客郎中,分司东都洛阳,他举姜伦自带。于大和二年春回长安后,又作《再游玄都观》诗云:“百亩中庭半是苔,桃花净尽菜花开。种桃道士归何处,前度刘郎今又来。”这年秋,他作《始闻秋风》也是有可能的。“一年”当指由洛阳返长安的时间。但我还是愿意或倾向于该诗作于连州,因其当时正值盛年,故有马思边草、雕眄青云的壮气,若在五十七岁,其诗已多老人衰飒之音。这从其前一年在洛阳所作诗《洛中初冬拜表有怀上京故人》中,可以徵之:“凤楼南面控三条,拜表郎官早渡桥”“省门簪组初成列,云路鸳鸾思退朝。”在连州则不然。清人贺裳评曰:“梦得(刘禹锡字)佳诗,多在朗、连、夔、和时作。”

元和十年三月乙酉,四十四岁的刘禹锡改授连州,与改授柳州刺史的老友柳宗元同路南行,至衡阳分手时,刘禹锡有《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》,中有句云:“重临事异黄丞相”,“重临”,就是指第二次授连州刺史。黄丞相指西汉黄霸,曾两任颍州太守,有“循吏”之称。刘禹锡虽然两次任连州刺史,但第一次赴任中途即被贬郎州司马,尚未到任,所以说“事异”。

明晓此背景,则《始闻秋风》中“君”与“我”的所指就十分明白了。“君”指秋风。“昔看黄菊与君别”,联系到“一年颜状镜中来”,“我”,就是指刘禹锡。“我却回”,言再授连州刺史事,即元和九年在朗州别秋风而赴长安,于元和十年五月又回到了连州,又闻秋风,历时恰恰一年。颜状虽可叹而心志不稍衰。铸而为此诗,便成绝唱。首联,言岁月经历也;颔联,言人生沧桑也;颈联,言壮志不挠也;尾联,乃直抒胸臆也。这正是刚正不折的刘禹锡,也正是刘禹锡桀傲雄豪的诗风。故而编《唐诗别裁》的沈德潜,评此诗曰:“下半首英气勃发,少陵(杜甫)操管不过如是”,绝非过誉。 □杨乾坤